

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

苏共党史

〔英〕伦纳德·夏皮罗著

東方出版社

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 苏共党史

〔英〕伦纳德·夏皮罗 著

徐 葵 邹用九 裘 因译

果 明 出 版 社

Leonard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71

根据美国纽约兰登书屋 1970 年增订第二版 1971 年印刷本
译出。

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

YIGE YINGGUO XUEZHE BIXIA DE SUGONG DANGSHI

作者/[英]伦纳德·夏皮罗

译者/徐 葵 邹用九 裘 因

封面设计/倪天煦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新华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2.5 字数/579,000

版次/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178-0/K·29 定价 11.60 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伦纳德·夏皮罗(1908—1983年)是英国著名的苏联问题学者。他撰写的这部苏共党史第一版1960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1970年由纽约兰登书屋出增订第二版。本书根据第二版1971年印刷本译出。

本书的资料收集和写作过程是同50年代中期美国的苏联问题学者组织的一个苏共党史研究项目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对苏联的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展起来的。美国最早的两个苏联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和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先后创建于1946年和1947年。50年代是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50年代初期,美国的苏联问题学者撰写和出版了第一批有关苏联经济、政治、历史、社会等方面的著作。50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也成了美国的苏联问题学者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当时由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所长菲利普·莫斯利发起,确定了一个苏共党史研究项目,吸收了30多名学者参加研究。根据这项研究计划,他们还邀集20多名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移居美国的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和后来移居西方的前苏共党员提供了大批资料,撰写了回忆录。书的注释中多次提到的波·伊·尼古拉也夫斯基就是移居西方的孟什维克之一。

本书作者伦纳德·夏皮罗是应主持这个研究项目的委员会的邀请而撰写此书的。伦·夏皮罗1908年生于英国格拉斯哥,在俄国度过了他的童年,在那里一直居住到十月革命以后。1920年他回英国上学,以后长期充当律师。二次大战中曾在英国军队的总参谋部任职。1955年起他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任政治学教授,

专门讲授苏联政治。他的主要著作有《共产党专制制度的起源》和《苏联的政府和政治》等。

伦·夏皮罗撰写本书共用了3年时间。他在写作过程中利用了为苏共党史研究项目所组织撰写的大量研究报告、回忆录和资料。本书第一版主要写到斯大林逝世为止。第二版增加了《斯大林去世以后》这一部分,包括《赫鲁晓夫的发迹和下台》和《1953—1966年的内部发展:意识形态和政策》这二章。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材料比较丰富。作者参考的书籍范围相当广泛。书中引用了苏联早期出版的大量文献和布哈林等人的不少言论和著作,以及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学者发表的有关苏联党史的许多研究文章;也引用了西方学者撰写的关于苏联历史和政治等问题的一系列著作,所引证的重要材料交待了出处,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立论的依据。

但是应当指出,作者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立场来看待和研究苏共历史的,因而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作出的论断不能不反映他本人的立场和观点。尽管作者在书中自诩尽量避免对历史是非作出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例如,作者在阐述1917年以前苏联共产党形成年代这段历史时,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的主张和活动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他认为,称司徒卢威等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恰当的”,给“经济派”贴的“经济主义”的标签是“臆造的”,对孟什维克提出“取消主义”的指责是“莫须有的”,等等。这些结论都是作者对历史是非所作的主观判断,说明他不同意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取消主义”等机会主义的斗争,他所反映的正好是一些孟什维克的观点。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在阅读时加以注意的。

自50年代以来,西方出版研究苏联各种问题的专著相当多,但系统介绍苏共党史的著作很少,本书是在西方影响较大的一种。虽然本书是十多年以前出版的,但由于它汇集了大量资料,反映了当时西方学者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研究成果,从掌握多方面的史

料和了解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的学术思想与观点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原著有一个跋,因内容主要不是写历史,故略去。

徐 葵

1989年7月

目 录

第一版序	I
第二版序	10
前 言	13
第一部分 形成年代	31
一、“经济主义”的矛盾	33
二、《火星报》的诞生和第二次代表大会	52
三、列宁反对《火星报》。1905年革命	72
四、重建统一的努力	91
五、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	106
六、走向最后分裂	122
七、列宁弄巧成拙	148
八、战争和革命	165
第二部分 从列宁到斯大林	181
九、夺取政权之路	183
十、国内战争中的党	203
十一、处于威胁之下的共产党统治	225
十二、列宁和同事们的冲突	241
十三、党的组成和党的机器：1917—1922	260
十四、对地方的控制：军队和立法机构	281
十五、领导层内部冲突：第一阶段 ^①	296
十六、托洛茨基的失败	316
十七、党的成分：与政府的关系	339
十八、军队和安全机关：工业和农民	355

十九、知识分子的生活：党在国内外的政策	371
第三部分 第三次革命	387
二十、布哈林的失败	389
二十一、第三次革命	406
二十二、斯大林战胜了党	428
二十三、清洗的高潮	448
二十四、成分和结构：1929—1941年	465
二十五、党和国家（国家，工农业，文化，学说，宗教）	482
二十六、非俄罗斯民族；对外关系	503
二十七、战争：党对军队的控制	517
二十八、战争的后果（工业，农业，党的成分）	534
二十九、知识分子的苦难。斯大林的逝世	556
第四部分 斯大林去世以后	575
三十、赫鲁晓夫的发迹和下台	577
三十一、1953—1966年的内部发展：意识形态 和政策	605
附 录	641
一、参考书籍说明	641
二、1898—1966年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 的日期	656
三、1917—1966年政治局和主席团委员和候 补委员	659
四、党的书记处的组织机构	667
五、1959—1964年中央委员会的书记	671
索 引	674

第一版序

IX
本书试图叙述一个政党的历史。这个党在近 42 年的时间中，在一个过去被称为俄国的国家里，实际上完全控制了整个政治权力。这个党，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由几个相互争斗的派别所组成的广泛革命运动，过去在大约 30 年时间里，曾经为推翻君主制度而努力。一个派别，它现在被称为苏联共产党，终于在 1917 年俄罗斯帝国垮台之后取得了政权。所以，我所叙述的延伸 3/4 世纪之久的历史，分成几个独立的部分。首先必须说明这个运动的性质，今天的共产党人的先驱者布尔什维克就是从这一运动中产生的。我要提醒读者，如果说我较比详细地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时期，这是有两个原因的——虽然我希望读者如有足够耐心读完开头几章，他自己也会发现这些原因：第一，假如对 1917 年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的形成年代中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知识，就很难了解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决心要推翻表面上看来是民主的共和政府——1917 年的临时政府，也很难了解他们以后的许多政策；第二，现有的历史书对 1906 到 1917 年这段极其重要的时期大多保持缄默，我想，努力去填补这个空白是正确的。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整个形势起了变化：过去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的几个政党中，有一个成了在国内行使权力的唯一政党。这时，它不仅变得完全不同于那些有几个互相竞争的政党存在的国家中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且也给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人们再也不能把党的历史看作同整个国家的历史分开的东西，党的历史越来越变成同整个国家的历史难分难解的东西。但是我并不企图说，我所写的是苏维埃国家

的历史。我当然力图把事情展开的历史背景充分描绘出来，以便
X 使我的叙述易于理解。但是我的整个目的是在追踪这个党的发展——说明它的思想、它的目标、它的成功和失败、它同人民的关系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对党的机器、对党员的社会成分和人员素质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一句话，我所努力做的，就是为这个党写一种传记，其中所讲的史实从不远离传记所记述的主体——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这有待别人来判断。我只希望人们在作出他们的判断时多少能宽容地考虑到这个任务的艰难和新颖。

然而读者会理所当然地提问，为什么我试图用这种方法把党的历史同国家的历史分开呢。我想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就我所知，列宁在1917年后所发展的统治国家的方式在政治制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说在其他国家仿效它之前是独一无二的。当然，通观这段历史，其中出现过专制、专政、虐政、专制民主，或者人们喜欢用来称苏维埃政治制度的其他什么称呼。但是，列宁的政治制度还有一个特征：它建立了苏维埃、法院、工会等这些表面上是独立的政治机构，但从一开始就使这些机构中的每一个机构都只能在一个单一的政党的控制下活动，这个党的党员是用一种意识形态和严格的纪律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研究这一新的政治制度的关键成分，研究它的长处或短处、它的困难和发展，可以多少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些政治机构。

本书第三部分是从1928年开始的，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斯大林的个人特性以及他的政策对国家生活（这方面的事情人们已讲过许多次了，我不想再去详细复述）和对党本身的性质和发展所产生的强有力影响。列宁当然曾经控制过党，但他是通过党进行统治的。当斯大林成为没有人能与之较量的列宁的接班人之后，他显然是既凌驾于党之上，又通过党进行统治。换句话说，有时候他的个人独裁既是针对党本身的，也是针对国内其他
XI 人的。起初我想写到斯大林之死就结束本书，这哪怕只是因为

斯大林死后度过的6年中所发生的事件离我们太近，以致使我们难以勾画出一幅关于这些事件的不偏不倚的图画。但是最后我感到，如果这样做，有给人留下基本上是一种虚假的印象的危险。斯大林在世时，党遇到的和党内发生的事情有许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一强有力人物的个人特性造成的，以致我认为是这种党治形式的基本特征的东西有时候却显得黯然失色或模糊不清。可是，过去6年中的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征兆，指明了哪些特征看来是属于党的本质的，是党的传统的一部分——例如党不受法律约束这一点；也指明了哪些特征看来是更多地同一个特定人物的个性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施行大规模的恐怖。于是我加了一个相当长的跋，^①我在跋中没有去写党从1953年到1958年的详细历史，而是试图把短暂的东西从更为固定的特征中筛选出去。

哪怕仅仅是因为今天苏联的统治者经常利用他们描绘他们昨天的图画来影响今天，所以谁只要想写苏联，谁就会陷入当前的政治中去，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也许我最好在一开头就声明，我并不效忠于任何一个政党，虽然我应该承认，我对一些老生常谈的原则颇有一点偏爱，那就是：对人的生活和尊严的尊重、思想和言论自由、正义、真实和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但是，用政治去影响苏联历史事实的不只是苏联的统治者。在苏联国外，对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对苏联的失败或成就所抱的“忠于信条的”看法也会导致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态度都是错误的。也还有一些人，我不说他们是历史家，而说是政论家，他们列举的事实（我全然不是指看法）是根据苏联政府官员承认什么或肯定什么而不时改变的。这种态度本身的问题就是它的不稳定性——一两年前发表的作品，如果让它们从宽容的忘却中复苏的话，就会显得相当离奇荒诞。还有一些人是根据动机来判断共产党的行为的：因此，那些赞成布尔什维克或他们的后继者共产党员所宣告的目

^① 由于跋的主要内容不是谈历史，故略去。——译者

的和最终目标的人，愿意宽恕他们在别的情况下本来会加以谴责的行动；反之，那些因共产党的政策有时迫使人们付出痛苦代价而感到反感的人，容易把最卑鄙的动机归罪于执行这种政策的人。

XII 我的看法是，人的动机不仅一般说来是难以肯定的，而且无论如何很少是纯而又纯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对人的动机的好坏作主观的判断，而让事实本身去说明问题。

也还有一些人喜欢用超时间性的观点 (*sub specie aeternitatis*) 去看苏联历史。这种方法在英国特别流行，或许占了主导地位。这些历史学家好象置身于遥远的未来，并从他们设想的有利角度去回顾苏联在 1917 年革命后的大的发展趋势。于是种种细小的困难和暂时的粗暴都淹没在“大的历史范畴”中了，当时在眼光不那么远的人看来是出于一个人的个人野心，或对人民暴动的恐惧之类的平庸考虑而作出的有些行动，现在都被看成是由不可避免的经济和历史力量所决定的一个连续不断的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种方法错就错在它必然要作出这样一种假设，即不管人们采取什么政治行动，因为事情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所以它就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发生。例如，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由于没有一个政党或政府所能抗拒的一大堆错综复杂的理由，苏联总得发生某种形式的工业革命。但是我认为，除了斯大林这样作了决定和能够把他的决定付诸实施这个理由外，没有充分理由去设想苏联工业革命非在斯大林决定的时间并以他决定的方式发生不可。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政治。

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同的陷阱，我很想避开它们，所以我力图以不加修饰的事实为限。我希望读者依靠注释中的参考材料（不幸的是这类注释是无法避免的）和能够在附录中找到的参考书籍说明的帮助下自己去判断，究竟我所引用的事实材料在多大程度上可认为是可靠的。当然我把关于理论的叙述也包括在事实之中，这些理论被认为是行动的依据。究竟理论和行动是否一致，如果是的话，则一致的程度究竟如何，这也要由读者去判断。我当然

不时地试图从事实中作出一些结论——一本书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根本不值得一读。但是我总是力图提供充分的事实基础，以便使读者可以作出他自己的不同结论，如果他不同意我的看法的话。

我在一开头就要告诉读者，这本书主要是写一个政治机构，也就是一个执政党。现在有一些因素，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起作用的。我发现，不管马克思或列宁对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政府性质是多么独特，在某些方面苏维埃政府仍然显示出它同其他政府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不是就它的结构来说（我想我已经指出，它的结构确实是独特的，虽然也许不象列宁讲的那样），而是就它所面临的问题来说的。例如，即使是在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集中化的政党中，也产生了分散行政管理职权的问题。再如，所有政府都致力于保持权力，尽管它们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可以不同，共产党的政府也不例外。所有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有许多人，由于某些大概是感情上的原因，只要一把“权力”这个词同共产党联系起来，他们就有反感，对这一点本来是无需再提的。有人常说，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考虑到党的行动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理论。但是在我所叙述的这段历史过程中，如果不把党的许多行动放在这样的事实背景中去看，即在很长时间内党对国家的控制并不稳固，而且走错一步会意味着它的垮台，那就很难理解了。不去注意象红线一样贯穿于苏联历史的这个因素，就等于是写虚幻之事，而不是写实际发生之事，所以我并不要为我在叙述过程中不时向读者提醒对权力的考虑在许多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而作什么辩解。我曾发现许多在我看来是由于现实的形势而牺牲理论考虑的事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过一个事例能说明党为了学说上的考虑而准备去承担丧失自己权力的风险，这一事实更使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承认，我觉得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最后，谈一下对是非的主观判断问题。我尽可能避免作这种判断，因为我认为，专家的职能就是尽其所能去作诚实的分析，以便

使读者能依靠分析的完整性去形成他自己的判断。出于这种想法，我力图把读者衡量事物的标准尽量设想得更宽广些，以便给所有读者都提供进行判断的基础。有的人可能把政府完全看作保证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发展和最大的物质繁荣的手段。另有一些人可能还在政府身上寻找其他的本质，比如发展被统治者的精神需要，提高他们的自信心或他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一些人来说，政府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对另一些人来说，政府的目的是扩张领土——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这个单子上再列上好多目的。受政府统治的人应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最好的，或者反过来，应把这留给比他们更聪明，或更有天赋，或更坚强，或更有魄力的人去决定，对这一点看法也会有分歧。假如我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有时显得有些强加于人，如果读者不同意这些看法，我只能请求读者宽恕，我请他接受我的保证，我已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使他能掌握足够的事实以及我相信所有有关的事实，使他能形成更符合他自己关于好政府的标准的判断。

*

*

*

在化了大约3年时间写这本书之后，现在我至少有可能对别人的一些帮助和慷慨表示感谢，这是很大的愉快，他们的帮助和慷慨使我能够完成这本著作。

我是应“苏共党史研究计划”组织的邀请而写这本书的。这个计划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是由一个大学的校际委员会管理的。默尔·芬索德、哈罗德·H·费希尔和杰罗伊德·T·鲁宾逊等教授是委员会的成员，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是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使我有可能是得到我在其他情况下所看不到的铅印的或制成缩微胶卷的材料，给我提供做研究工作的帮助和出外旅行收集材料的经费（包括在纽约逗留了2个月），使我可以读到根据这个组织请人写的研究成果或回忆录的手稿。我非常感谢所有这些物质帮助，但我更感谢委员会的成员们自始至终给予我的好意的鼓励和明智的忠告。我特别要感谢莫斯利教授，他

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得同他打交道。虽然这要占用他许多时间，但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是乐于挤出时间给予帮助。我也要向这个研究计划的前主任艾尔弗雷德·G·迈耶博士和执行秘书约瑟芬·B·布鲁诺夫人致谢，感谢他们在管理工作方面给予的非常耐心的帮助。

我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得到研究苏联政府的最杰出的年轻学者之一、现在是堪培拉大学学院的T·H·里格比博士的协作，这是我的好运气。里格比博士的研究主要涉及苏维埃时期党的结构、组织和组成，和过去20年中党的高级领导。他的研究具有透彻性，而且质量高，这反映在所有他的著作中。本书第13、17和24章很大部分是以里格比博士的著作作为依据的，整个第3部分和跋在很多地方也归功于他的研究和思想。为这一切，我要感谢里格比博士，我也要感谢他在书稿的全部写作过程中为阅读和评论这部书稿而操的心。

我也要感谢波·伊·尼古拉也夫斯基先生。人们经常地和正确地在许多著作的序言中，把他称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的活百科全书。尼古拉也夫斯基先生十分慷慨地提出建议，给我帮助，并把他的书籍和文件借给我。他让我使用他正在编辑的一大卷文件集的原稿，这些有关革命前党史的文件大多数是没有发表过的。他给这些材料加了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写出来的详细和有见地的注释。他也读了我的全部书稿并作了评论，还提出大量宝贵的建议和批评。

除了尼古拉也夫斯基和里格比先生的帮助之外，我感到十分荣幸的是，一大批从事苏联研究的其他极有名的学者也乐于拿出时间和精力来阅读我的全部或部分手稿，并提出评论意见。我要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是：约翰·A·阿姆斯特朗教授、G·H·博尔索弗博士、塞尼娅·J·尤金夫人、默尔·芬索德教授、哈罗德·H·费希尔教授、戴维·富特曼先生、O·H·甘金博士、利奥波德·H·海姆森博士、约翰·N·哈泽德教授、G·卡特科夫博士、

J·L·H·基普博士、已故的V·列昂托维奇教授、艾尔弗雷德·G·迈耶博士、亚历克·诺夫先生、G·H·N·塞顿-沃森教授、罗伯特·M·斯拉泽先生、唐纳德·W·思雷戈尔德教授、S·V·乌德金博士、伯特伦·D·沃尔夫先生和H·威利茨先生。

XVI 很难恰当地充分表达我对所有这些学者所欠的谢忱。他们的评论意见的多样性，他们学识的详尽深邃，他们的判断的透彻，这本身对我都是一种教育。他们使我免于许多事实和判断方面的错误。对于还存在的事实方面的错误，应由我个人负责，这些错误，是由于我的固执或无知。我还应公平地补充一句，上面提到的那些学者并不总是全部同意我的意见的，我对这些事实所作的注释，那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

此外，我要感谢S·V·乌德金博士，他编制了作为本书附录的苏共历届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一览表和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

我也应感谢经常给我帮助的下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列颠博物馆、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图书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俄国和东欧历史和文化档案馆的馆长L·F·马格罗夫斯基先生、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我主要是在这些图书馆中工作的。

我尤其要感谢卢因森夫人(乔吉特·顿钦博士)，她极其熟练地为书稿一遍又一遍地打字，做了书稿付印前的全部编辑工作，编了索引，并在很多方面为减少出一本书所要化的劳动提供了总的帮助。

我也要向芬索德教授和哈佛大学出版社致谢，感谢他们同意我从《俄国是怎样统治的》一书中转印了收在附录中的5张图表。

我也要向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致谢，感谢它在我写本书时，用各种方式提供的合作。

我也向我的老朋友海韦尔·戴维斯致谢，他用诗人的眼光读

了书稿，并为了改进本书提出了只有一个诗人才能提出的建议。

最后，我要向我的夫人致我不足以用言词来表达的谢忱。她不仅反复阅读了书稿，并不断提出修改意见——总的说，这也许就是那些丈夫要进行写作的不幸的夫人的命运。同我相比她所研究的是一个平静得多的世纪，但她还是从她自己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为我做一些必不可少的和极有价值的研究。

伦纳德·夏皮罗

1959年6月

于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